



思中国现时社会，《新青年》的诞生就是最好佐证。然而他们大部分人都是理论家，评论者，有着庞杂而果敢的政治意图。但鲁迅不是。他不像陈独秀等乐观冲动，多次撰文说自己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，社会由此而改变；深刻怀疑精神里面藏了一个彻骨凉意、特立独行的文学人，思想家。

更重要是，《狂人日记》的出版，让新文化运动从“务虚”的悬谈讨论变成了文学的讨伐，让新文化运动从新诗引领风骚转而成为白话小说的全面介入。这是在语言、文体、思想和社会效用上的重大转折。《觉醒年代》中，胡适担心《狂人》过于激烈，陈独秀则戏谑，此文对国民性的批判最深，怕是“抢了你这个倡导白话文的头功”，可见一斑。

同年发表于《新青年》第5卷的《我之节烈观》，更是提倡男女平等、抨击害人妇女节烈行为的雄文。其中开头就驳斥了所谓“世道浇漓，人心日下”托词下各种伪君子批评世风，放过自己丑行的借口，让中国诸多男子无地自容。之后用“疑问体”反诘（一）不节烈如何祸害国家（二）女子何以要承担救市责任（三）表彰节烈有何效果。种种社会怪相，症结就在于女子是男子的私有物品，被任意支配。而一个月后，《随感

录二十五》则将把矛头指向孩子教育，“早娶妻，早生子，多子多福”是封建落后伦理观、生育观，其中忽视的是“人”的萌芽。此言此观，今日依然独到。

铁屋的《呐喊》，最畅销小说

《狂人》之后，鲁迅一发不可收，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的小说篇篇击中时弊要害，振聋发聩，俨然已自成一个批判和揭露的小体系：《孔乙己》（1919年4月）写出旧礼教下迂腐而穷困的士人，“窃书不能算偷”，“回字还有四样写法”；《药》（1919年5月）中“鲜红的馒头”至今仍提醒社会先驱者被看客们消遣后的余孽，精神疗救远比生命康复重要百倍；《风波》（1920年9月）那句“一代不如一代”深深戳痛了保皇党心中的“辫子梦”，却变成了社会达尔文论最好的注脚，嗟叹年轻人之不堪；《故乡》（1921年5月）聚焦阔别廿年的土地，没有任何进步，“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”，而其中闰土和杨二嫂的人物形象已成现代文学的经典；《阿Q正传》（1921年12月在《晨报

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剧照，曹磊饰鲁迅。

